

比较经济体制学

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

江春泽 著

人民出版社

比较经济体制学

——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

江春泽 著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 健

比较经济体制学

BIJIAO JINGJI TIZHI XUE

——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

江春泽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625印张 277,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700

ISBN 7-01-001067-6/F·153 定价5.30元

采地山山石，
比較研究，
按我國國情
改革發展。

祝賀比較經濟學制

學出版

馬洪
王光美
1980年

作者简历



江春泽 女 1935年生 安徽旌德人，195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并在外语学院受过俄、英两种外语专门训练。曾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及该院研究生院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30余年。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研究生院教授，1988年以后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苏联东欧学会理事，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伊利诺大学、印地安纳大学访问教授，美国斯密森氏学会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与美、欧一些著名大学作过学术交流，出席过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曾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过约150篇学术论文，撰写过数十篇内部研究报告，出版过著作及英、俄、塞语译著（包括集体合著）共17本。被列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华夏妇女名人辞典》。主要著述如：《论工业生产专业化》、《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南斯拉夫》、《苏联东欧经济管理体制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世界经济概论》、《社会主义计划》、《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等等。

序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近10多年来，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同时，对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学成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鉴别，批判剔除其庸俗性的糟粕，吸收借鉴其带有科学性的精华，经济学界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一大批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应运而生。比较经济学包括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百花园中绽开的一朵新蕾。

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虽然在我国起步时间不是很长，但在世界上却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本世纪60年代以来已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

用科学的态度分析、借鉴这一新兴学科中的现代成果，在我国开展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并建立我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经济体制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是作者江春泽同志（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比较经济学教授）近些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它集中反映了作者80年代对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书中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理论、方法论及不同体制的比较进行了探索和新颖的阐述。它的问世，对于在我国广泛开展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对于完善和建立这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积极意义。正

因为如此，我特意向经济界和出版界推荐这本专著。

本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把体制择优作为中心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全书的研究。所谓体制择优，就是通过比较，设计和选择最适度的经济体制来达到尽可能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体制择“优”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科学地定义“经济体制”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即构成经济体制的三项基本要素：财产权亦即所有制关系；经济决策结构与类型；资源配置方式亦即计划、市场或二者的某种结合。这三项基本要素不可分割，构成一个整体。上述关于经济体制的定义，为世界上各种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比较抽象出了可比的共同基础。从而使对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个别体制模式的简单现象描述上，而是可以从新的角度比较其异同，分析其优劣。

二是书中明确指出，所谓优体制不是理想化的，而是“适度的”。尤其是明确提出衡量体制“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经济结果。“优”体制是与经济体制相关的经济结果同体制参与者所追求的目标相吻合时的经济体制三要素的特定组合状态。其目标是取得理想的经济结果，而体制择优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这些见解在理论上和论述上都具有新意，对于这一学科形成独立的体系，获得更加严密的内在逻辑也有所推进。

本书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描述和国别实例描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既充实和丰满了作者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有助于读者拓宽思路，开阔视野，进行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比较、分析和借鉴。

最后，本书还分析了体制择优基本途径。作者关于体制择优的途径的阐述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给体制改革和调整过程中目标模式的设计和选择方式，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决策结构的集权与分权，价格与市场机制的真正本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

结构与功能，等等，都是本书关注的中心，也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凡是产生了改革必要性的经济体制，都是由于经济结果和经济目标发生了偏移或严重的不吻合。改革无非是调整或改变体制状态，从而使经济结果与经济目标相协调。其逻辑结论就在于此。这一结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正如作者也坦率地承认的那样，本书的研究还存在着某些弱点。首先，尽管作者已经分析了某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变动和运行，都要受到有关环境因素的作用，促进或是制约，这说明经济体制并非经济结果的唯一导因。但是如何从多种导因中把经济体制要素分离出来，书中分析的不是很清楚；其次，从实证的角度看，对不同体制进行简单类比推理本身的可靠程度有多大，也很值得推敲；此外，在统计和描述技术上的粗糙甚至牵强的痕迹也不难发现。尽管如此，瑕不掩玉。由于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门学科本身的不成熟性及比较分析中很多难于量化或类比的因素，存在上述缺陷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作者。毕竟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闯开了一条新路。希望作者能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补充和完善自己的著述。

刘国光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八日

前 言

研究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 写好90年代深化改革的新篇章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我近些年关于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以后的近代经济史表明，经济发展的结果与经济体制之间有紧密的依存关系。这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经验上，都可以作出说明。正是这种依存关系促使人们要把经济体制本身作为实现生产力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来加以选择。

8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新时期。从经济发展的结果看，1978—1988这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了1.5倍，年平均递增9.6%，而改革前26年（1953—1978年）的年递增速度只有6.1%，前者比后者快了约60%。这10年的人均生活水平，在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以后，提高1.1倍，年平均提高7.7%，而改革前26年的年平均提高速度仅为2.2%，前者比后者快了两倍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现代化的程度也明显提高了。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中国80年代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可以从经验上说明发展与改革之间的依存关系，即经济结果与体制优化之间的依存关系。

90年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10年的目标，是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使国

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为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为顺利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有必要总结过去12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解决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探求能够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最佳体制方案。我衷心希望，我奉献的这本专著，不仅能为我国建设“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新学科铺垫一块砖瓦，而且也能有助于正在投身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人们写好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

本书着力阐明的中心思想是，如何通过最有效地使用经济体制这个变量，来达到获取尽可能理想的经济结果这一目标，简言之，就是体制择优，亦即“优”体制的确定。再往前推，其逻辑起点是关于“经济体制”的界定。在本书里我曾经钻进了“探求定义”的领域，为的是深入研究国内外同行对这个专门领域里的定义已进行过的探讨。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我们自身所处的经济体制的直接理解，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在本书所下的定义中，着重分析与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三项基本要素：财产权亦即所有制关系，经济决策结构与类型，资源配置方式亦即计划抑或市场以及二者的某种结合。经济体制的要素是三位一体的，必须同时选择和设计，只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制的机能才是高效的。

所谓“优”体制不是绝对的，把它理解为“相对合理的”或“在某种具体条件下令人满意的”也许更为合适。但必须明确的是，衡量体制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经济结果。所以，“优”体制的含义是：与经济体制相关的经济结果同体制参与者所追求的目标相吻合时的经济体制三要素的特定组合状态。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经济目标本身确实合理。一般地说，一个现代经济所追求的目标是由体制参与者经过科学与民主程序产生的。这里，体制参与者的行为是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果之间的极其重要的中介相关因素，这也是我们为

为什么要研究政策——作为体制参与者的政府的行为——的原因。

如果在某个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果与经济目标不相吻合，那末，从经济体制角度看，把改变或调整体制状态作为使结果和目标相吻合的手段之一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席卷中国、苏联及其它国家体制改革的狂飚之所以掀起的深刻根源。

在倾心于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也希望这本著作有社会应用方面的意义。研究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论，这本身就暗示了它的潜在应用性。经济体制的模式描述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不小。比较经济体制学是一门多模式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者所描述的经济体制模式之别，不仅在于概念和假设上，而且在于它们阐明的问题和角度不同。在本书里较为详尽地展示了众多知名研究者所描述的体制模式并予以适当的评论，是为了给体制择优拓宽视野。本书提出的粗浅之见，体制择优的基本途径大体是：

（一）对各种类型的经济体制进行描述，对其运行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运行后的目标与结果的对比进行分析，揭示利弊，趋利去弊。

（二）通过比较，找到那些具有更佳经济结果的体制，作为本体制横向借鉴的潜在对象。

（三）对某些可供选择的体制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其可能导致的不同经济结果，权衡后择优取之。

（四）总体设计一种创新的体制，或者对原体制作局部的调整。前者属于模式的转换，后者属于原型改良，或局部横向借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可能获得的效果大多取决于对各体制间的属性的分析从而进行类比推理，只有在一些基本属性近似的条件下，借鉴或采纳其他具有更好结果的模式，才会在某种程度上使本体制达到优化的目的。

毫无疑问，对经济体制的比较分析有很多困难。首先，从逻辑

辑有效度来看，经济体制并非经济结果的唯一导因，如何从多重导因中把经济体制要素分离出来是一个难题；其次，从实用中的准确有效度来看，对不同体制进行类比推理的可靠性程度，总要打一些折扣；再次，统计和描述技术上也有一些困难；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体制的优劣作出某种程度的定量测定。自1980年以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每年定期向全世界公布一份各国竞争力的报告，评估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国情对该国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的有利与不利影响，这种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实际上可使本书的体制择优理论具体化。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吸收了张宇燕（我在1983—1986年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现在他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硕士论文中关于体制择优途径的一些好见解。本书第五篇关于经济体制模式化的描述主要得力于他。此外，对经济体制的定义及全书的体系结构，我们师生之间经常切磋，相互拓展思路、补充材料，相互批判或验证对方的思维逻辑。我要感谢他为本书增色所作的奉献。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还得到刘大庆、赵艾、何忠泽等几位青年经济学者的协助。他们按照我在书中对经济体制所下的定义，按照本书的思路、逻辑和要求，为本书第四篇补充整理了若干经济体制的实例描述，使本书更加丰满。

本书从酝酿到脱稿，还曾得到过国内外很多同行的启示、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初稿完成于1984年，此后几易其稿。无限内疚的是本书推迟了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我毕竟是在艰辛地开拓这片生荒地，不成熟和粗疏即便经过了几易其稿的努力也在所难免，敬希同行们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江春泽1991年春修改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1
第一篇 导论	1
第一章 一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经济学科	1
第二篇 经济体制的界定	27
第二章 比较经济体制学的逻辑起点——经济体制 的概念	27
第三篇 经济体制的分类	50
第三章 经济体制分类的标准	51
第四篇 若干类型经济体制的实例	61
第四章 英国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	62
第五章 美国垄断主导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73
第六章 法国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混合经济 体制	85
第七章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98
第八章 瑞典“福利国家”经济体制	121
第九章 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142
第十章 南朝鲜“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155
第十一章 印度的发展型“混合经济”体制	164
第十二章 智利外向型市场经济体制	177

第五篇 经济体制的模式化描述	191
第十三章 经济体制模式化的描述方法	192
第十四章 奖金(报酬)最大化模式	199
第十五章 里斯卡的“承包经营制”模式	211
第十六章 关于市场经济模式的描述	222
第十七章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述评	229
第十八章 短缺模式及对模式的六重分类	239
第十九章 按决策权分布划分的模式	250
第二十章 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模式	255
第二十一章 所谓按“主义”分类的经济体制模式	263
第二十二章 对经济体制模式的色谱分析	268
第二十三章 经济体制改革并非“趋同”	281
第六篇 经济体制的比较与择优	293
第二十四章 关于经济体制比较标准的讨论	294
第二十五章 经济体制发挥功能的环境因素	303
第二十六章 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	327

第一篇 导 论

第一章 一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 新兴经济学科

一 比较经济体制学是独立的经济学分支

(一) 什么是比较经济体制学

比较经济体制学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有人形象地把它喻为经济学帝国中的一块“新殖民地”。

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经济体制置于分析的中心。具体地说，比较经济体制学突破了传统的“主义”分类方法的框架，运用所谓“现代”方法把经济体制从基本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把它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性事物，并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通过评价经济体制与经济效果的关系，从而达到对经济体制进行择优的目标。

拓殖比较经济体制学这块“新殖民地”的先驱者们注意到，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或地区都在以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方式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而且解决的途径也不一定是单一的，那么，哪一种

途径以及它在何种环境下是更可行的和更有效的呢？这就需要抽象出一些概念、术语来对各类经济体制及与其相关的环境因素，以及它们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和评价，评价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使某种特定环境下的经济体制优化。当他们试图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领域推进到经济学前沿而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了。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取代比较经济体制学

正如上述，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比较经济体制学，是指近20多年在西方逐渐形成的、有自身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的概念、术语和方法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而不是泛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①也不能简单化地把这一学科的兴起推前到马克思主义创始的时代。^②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重视在经济理论中系统地进行比较研究”^③的，他们的经济学著作是贯穿了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的方法的，无论是就其总的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或是就其对具体制度分析的理论与逻辑水平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与高度，都不仅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行动和研究的指南，而且连西方学者也不能完全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的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对后来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新的经济学分支有着深远的影响。^④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比较不同经济体制的研究中的意义，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大学所开设的比较经济体制学的

①②③ 持这种见解的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87年第1期第1页。

④ [美]E·纽伯格：《比较经济体制概览》，载[美]《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2页。

课程设置中得到证实。威斯康辛大学的D. 格兰尼克教授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B. 瓦尔德教授所开设的《比较经济体制》课程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占有重要席位。^① 因此, 本书作者丝毫没有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或认为它“已经过时了”等想法, 相反, 我们是不赞同有这些想法的。但是, 我们认为, 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发展, 而且, 在实践需要的推动下, 过去和现在, 人们都要创立许多门类的具体科学。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 显然, 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门类繁多的具体科学, 同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取代比较经济体制学。以揭示生产方式发展规律性及其历史趋势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没有也不可能包罗近20多年在西方形成的、以具体环境下经济体制模式的评价与优化为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内容。

(三) 不能把比较经济体制学与制度经济学混为一谈

有些人误以为比较经济体制学无非是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 这种看法, 除了包含一些更复杂的原因, 这里暂存勿论外, 我们仅指出其中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把比较经济体制学与制度经济学混为一谈了。

固然, 比较经济体制学作为在西方兴起的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是有制度学派的影子, 但却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 在西方经济学大家族中, 从古典到当代, 无论是微观经济学, 还是宏观经济学, 尽管分支众多, 学派林立, 但其

① [美]E·托尔编:《比较经济体制学课程设置》, 1981年英文版。

②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505页。